

罗 弋 回 忆 录

下 册

〔印度〕M. N. 罗弋著

罗 易 回 忆 录

下 册

第三卷 在圣地

第四卷 革命到了亚洲

第 三 卷

在 圣 地

42. 在莫斯科的第一天

中午时分，火车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罗蒙诺索夫看了一下表说，完全正点。内战把俄国的铁路系统搞得混乱不堪。要过好几年，正常的铁路交通才恢复，行车才按照时间表。在1920年，整个铁路系统还专供军运，没有民用客车。谁都不能在车站买到票，坐火车到外地去。革命废除了货币，因此也就没有贫富之分了。只有拿着通行证的人才能利用铁路出差旅行。任何人要在饭馆里吃顿饭，店铺里买双长靴，或在城市里坐电车，都得出示劳动证。公共生活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革命的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办事。

罗蒙诺索夫带我们出站时向我们道歉说，要做到各线的火车都定时开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他又带着自豪感提醒我们：俄国的铁路从长度看，是世界第二。不过有一件事已经做到了：在这条连接两个都城的铁路线上，每天至少有三班列车开行，而且都是正点。这时他放低了声音添上一句说，这个国家里的二号要人，每周三次乘坐这列载运我们的火车旅行。不过我们所享受的权利，还没有达到可以同他乘坐同一班次

火车的程度。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能那样。

后来我听说他所提到的那个令人敬畏的人物，是季诺维也夫。他每周在那两个都城间旅行三次，因为他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又是具有最高权力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头戴堂堂三重皇冠的人物（别的任何人都没有那样显赫的地位），自然就被认为是仅次于列宁的最重要的人物了。

共和国的政治首都已迁至莫斯科，因为列宁格勒面临遭受入侵的危险。一支强大的德军还盘踞在芬兰境内，离国境线只有数英里之远。沙皇将军尤登尼奇统率的白军，在德国波罗的海部队的支持与协约国的怂恿下，在1919年的夏天已经推进到列宁格勒的南郊。莫斯科深处俄国的中心，不会受到那样的威胁。不过由于莫斯科一向是封建与反动力量的中心，所以它的社会和文化的氛围对于建立新的革命机构极不适宜。中世纪式的围以城墙的克里姆林宫，是一个最不适于做工农共和国司令部的地点。

与此相反，列宁格勒是个现代化的城市。它周围是一片工业区，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革命就是从那里开始，又从那里发展到全国各地去的。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不仅最先夺取了政权，而且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新的革命政府。因此，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和党组织在那个革命的国家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支配着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一个控制着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党组织的人，就享有极高的威信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在1920年，这个人就是季诺维也夫，他很自然地相信自己在新政权的统治集团中仅次于列宁，一心想继承列宁担任最高领

袖。我到达莫斯科后不几天，便见到了他，当时我对他是否具有真正的伟大品质，适于他当时所担任的职位，不禁产生了怀疑。我对他毫无偏见。相反地，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他是列宁的得力助手。但历史却证明他不配得到这种荣誉。我的初次印象往往不错，这是又一个证据。

施利普金领着我们出站。我终于来到莫斯科了，这个念头使我非常兴奋，以至我在路上仿佛如在梦中。旅途已经走完了，兴高采烈的情绪此时使我的敏锐感变得迟钝起来了，这倒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亲身体验到的那种混乱、肮脏和单调的现实，说不定会使我灰心失望呢。一种新的制度总不能一夜之间便建成嘛。

车站前面有个广场，挤满了穿军服的人；瘦骨嶙峋的马拉着一辆辆破旧的四轮马车，冒着被那些不顾一般交通规则的汽车压碎的危险，在铺着鹅卵石的马路上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在发疯般急驶狂奔的车子上坐的都是军人，因此这种横冲直撞就更引人注目了。我设想这种鲁莽行为是权力感的表现，因为我根据生活经验懂得，权力感会使人对别人的生命漠不关心。一辆黑色大轿车开到我们前面停了下来，这时我才从最初印象（有些是意料到的，有的则没有意料到）所造成的迷茫中猛然惊醒。驾驶员穿着军服。罗蒙诺索夫打开车门让萨杜尔夫人上车。施利普金把地址告诉了他，车子就开动了。我们坐另外一辆放下车篷的车子跟在后面。在驾驶员旁的前座上，坐着一个手里拿着枪、面部表情严肃的战士。那辆重载的车子在石子路上高速度急驶时，上下颠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街道上一片荒凉景色，因为店铺的橱窗都钉上了木板。

似乎没有人在闲逛；所有的过路人都象是去办事的。

不一会儿，我们驶过架在一条不宽的河面上的铁桥。那就是莫斯科河。我们的车子沿河开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就慢慢地经由一道铁门驶进一个宽阔的院落，这里好象是一所私人的很大的宅邸。鲍罗廷来到门廊，领我登上一座富丽堂皇的木楼梯，进入一套房间，这房间简直使我大吃一惊。这不是宫殿；但到底是谁曾在这样一所豪华的大厦里过着帝王一样舒适和奢侈的生活呢？鲍罗廷回答了我那默默没有说出口的疑问。从前这里曾经是古契柯夫伯爵的市内宅邸。他是一个从事实业活动的贵族，在甜菜制糖业中有很大的股份，被人称为俄国“糖业大王”。革命废除了私有财产，“古契柯夫宅邸”就归国家所有；底层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汗的私人寓所。上面一层楼留供显要的国宾使用。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涌上心头的所有问题都提出来，鲍罗廷就把我带到一个高高的窗户跟前，把粉红色的厚缎窗帘拉到一边。莫斯科河就在房子前面流过；对岸是一道高墙，墙的后面，有许多壮观的寺院塔顶和高耸的教堂尖塔，中间有几个巨大的金色圆顶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光。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它建于数百年前，当时是个城堡，但规模之大，完全象一个设防的大城市里面筑有围墙的内城。我已到了莫斯科，而且就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

鲍罗廷住在邻近的一套房子里。他退了出去好让我准备用餐，开饭的时间是下午5时下班以后。晚上，我要去见卡拉汗，他就是我的东道主。晚餐与那幢房子成了明显的对比。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四周的高墙都镶着红棕色的木板，可是摆在那华贵的桌子上的饭菜，却是白菜汤、一片黑面包和“卡

沙”^①(用一种暗黑色的碎谷粒煮成)。鲍罗廷用冷酷的幽默语气告诉我,最后一道菜是奢侈的佳肴,就连菜汤里那一丁点肉也不是常有的。那是供应所有政府机关的标准伙食。虽然水平还很低,大家一律平等总算做到了;但是既然内战实际上已经过去,生活水平是会提高的。

现在的局势同去年冬天反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一步步逼近莫斯科的情况相比,已经好得多了。食物不足,燃料也很缺乏,而气温又远在零度之下。一些农民表示同情,跑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给列宁送来一车劈柴。莫斯科所经历到的种种困难,主要是由于农村反对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国有化土地上的全部余粮,已宣布为国家所有。农民除维持其生存所需的东西以外,就不愿再多生产了。结果造成城市缺粮挨饿。莫斯科居民极为稠密,苦头也吃得最多。

卡拉汗是个年轻人,大概还没有过三十岁,对于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来说,年纪太轻了。表面上他是几个副人民委员之一,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头头。齐采林要是不同他商量,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他是外交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人。然而,他的特殊兴趣是想同亚洲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利用那个关系作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媒介。他出生于美国,又是个最标准的高加索美男子。拉狄克有一次用很刻薄的讽刺语言,把他描绘成为苏维埃的一个最漂亮的蠢人。其实他并不蠢,只是不愿出风头罢了。也正因为那样,很少人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在此期间,他所处的重要地位却使其他野心勃勃的青年人妒忌起来,企图对他进行毁谤中伤。也许由于他

^① 卡沙(kasha),即稀饭。——译者

的容貌非常漂亮，所以他讲究衣着，蔑视当时人们把穿得破破烂烂当成革命热情的风尚。那些妒忌他的诽谤者把他叫做资产者。在那些易动感情、重视无产阶级纯洁性的日子里，对一个人损害最大的，莫过于“资产者”这个字眼了。卡拉汗就其出身来说不属于工人阶级，他也不曾企图隐瞒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革命前，他是彼得格勒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他除了到办公室去，很少离开他的住宅，出去办公时，他照例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戴着洁白无垢的硬领。有人指责他说，他对那种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东西特别欣赏，而对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实践却不那么喜欢。卡拉汗在反驳这种愚蠢的指责时说，白色的领子并不曾阻止他来到街垒参加战斗，因为他没有拿白领子去把他的脚踝捆起来。他的态度简直是不通时务，但是他始终认为，保持整洁习惯和穿得干干净净总比相信肮脏和不修边幅是革命朴素的象征为好。

饭后，我陪着鲍罗廷到他的房子里去。他必须继续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两天前，巴拉巴诺娃交给他一项任务：把列宁最近写的有关“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册子译成英语。原稿是用俄语写的。我在柏林时就已经听说过这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了。由于德语翻译不十分准确，出现了若干误解和错误的解释。英语和法语的译本必须译得好一些。既要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运动”，又要不使那些持有那种主张的团体离心离德，从而损害共产国际的基础；即使最优秀的专业翻译家也不容易掌握这种辩证法。用辩证观点去处理“左派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说得明白点儿，这个运动就是害了革命急

躁病和主张无产阶级的清教主义^①——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列宁的那本小册子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共产主义文献。所有忠实的信徒都必须阅读并弄懂这一文献。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共产主义的信念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但也并不排除依靠理解。列宁的学说要求人们既要有信念，也要能理解。那是辩证的关系。可是，他是用一种很不精练的文体写出来的，这是他老想在一句话里装进许许多多的思想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往往是仓促行文，这就使上述文风更严重了。向速记员口授内容，代替了自己动笔。他们或是上讲台作报告，或是向速记员口授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拉狄克，有这样一个习惯：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进行口授。在革命初期那种狂热的气氛里，列宁的文风变得更加纷繁难懂，更加雄辩滔滔，尽管他一向是自己动笔。拉狄克对列宁那种保守的习惯挖苦地说：老头子根本没有学会用口授的办法写信。

鲍罗廷在翻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时费了不少脑筋。书名按直译应为“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幼稚病”；但那字对字的翻译就没有抓住辩证法的真髓。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左派共产主义运动在书中受到彻底的批判。我建议增加副标题的形式，列宁同意这样做，并在以后所有的译本中都采用了。

钟敲十下，鲍罗廷提醒了我与卡拉汗约定会见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太晚了，我弄不懂东道主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接见我。他睡到快吃午饭时才起床，接着还必须处理一些公事，然后

^① 清教主义 (puritanism)，这里指象清教徒那样的刻板、机械。——译者

再到人民委员会去。那么现在去见他还有什么用呢？没有谈话的时间。鲍罗廷向我说明情况。外交部是在晚上办公的，因为齐采林宁愿白天睡觉。他习惯上允许各国外交官和记者在凌晨访问他。我们将陪同卡拉汗到外交部去，在那边还可以有很多时间谈话，也可以见到齐采林。那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权利。齐采林由于向各个帝国主义强国发出激烈的照会，在全世界已极为出名，并成了全世界革命者喜爱的一个人物了。

卡拉汗站在宽敞的客厅中间，那客厅也就是他在家里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很考究的黑外套，里面衬着他那条著名的白领子。他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尖梢胡子。一头蓬松发亮的黑发，仔细地梳往脑后。他迎上来同我握手。他和我交谈几句有关我旅途中的情况之后，就建议我们马上动身。鲍罗廷充当翻译。卡拉汗当时还不会讲外语。一辆大轿车在门廊里等着；几分钟之后，我们便来到了外交部的大门口；当时外交部占用着莫斯科一座最大的旅社的一侧房屋。卡拉汗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给武装警卫看，警卫仔细地对比相片与证件持有人的脸孔，然后才让他通过栅栏。鲍罗廷和我只好等着；一直等到一位公务人员带来一份许可我们进入的通行证，并经警卫人员查明我们确属获得许可进入的人之后，我们这才走进去。

为了等候许可进入苏维埃的外交圣地，不可避免地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被带到了副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卡拉汗坐在放有三架电话机的大桌子正中一张宽敞的皮面扶手椅上。在我们进行谈话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拿起两个话筒，同

时讲话。我很纳闷，要是三架电话机同时响起来，他该怎么办呢。

43. 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

卡拉汗坐在他那把宽阔的红棕色皮面椅子上，这把椅子以前一定是摆在“首都旅馆”的会客室里的。他隔着铺有绿色厚呢的大桌面递给我一大铁盒带有金黄色滤嘴的老虎牌香烟。这是苏联驻喀布尔第一任大使苏里茨寄来的。卡拉汗把这些香烟留给我，因为他认为这种商标具有象征性。鲍罗廷也为他的朋友的无聊举动帮腔，就毫无意义地添上一句：“是呀，上等的孟加拉老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就打开那装璜得相当华丽的盒子，里面装着格外粗大的香烟，并递给主人一支。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倒靠在他那把安乐椅子里，正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根雪茄烟点着。他以完全信赖的态度告诉我说，这盒烟是从施利普金所带来的外交邮袋里取出来的。

不久之后，我逐渐了解到，在早期那些欢乐的日子里，革命外交当局派出它的外交信使，带出去的邮袋装着共产主义宣传文件，回来时则装满一袋袋更有用的商品，例如供人民委员抽的雪茄烟，供他们妻子用的化妆品和丝袜子。共产国际特别信使施利普金的主要任务，正如谣传那样，是供应季诺维也夫眷属的需要。不过，那个头戴三重皇冠的人却是个清教徒式的人物；他不喝酒，不抽烟。关于他的眷属的那些议论，是

沒有根据的。他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并不重视。也正因为这个原故，他的私人生活也可能是随随便便的。但在文化教养上，季诺维也夫是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他特别注意一定要使人们所知道的他的私人生活是严格符合传统标准的。

现在回过头再来谈谈卡拉汗，他对新运来的汉堡出产的雪茄烟很喜欢，就同他的朋友鲍罗廷共同享受这种特权了。他们用俄语谈了一会儿，这使我颇感厌烦。我就一个劲儿地抽我的“上等孟加拉老虎牌香烟”，同时也偶尔好好地端详一下那个坐在桌子对面，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地吸着长雪茄烟的人——一张很美的鸭蛋形面孔，肤色淡褐，点缀着一撮黑胡子，虽然修剪得整整齐齐，两边尖细，但有些卷曲；样子活象个移居到文明环境里来的青年基督。可是卡拉汗并不是犹太人。也沒有传奇似的（当然很不可信）金黄色头发。突然间他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上，用俄语跟我说话。鲍罗廷为我们当翻译，

第一任苏维埃大使苏里茨已经申请解除他在喀布尔的职务。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能够在那样一种中世纪的气氛中长期生活下去。应该答应他的申请。我对于让鲍罗廷去喀布尔当新的苏维埃大使有什么看法？这问题提得出乎意料之外；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个问题竟然会对我提出来。

卡拉汗解释说：鲍罗廷从墨西哥回国的时候，曾报告过我渴望与在印度的革命同志取得联系。苏维埃政府根据其著名的宣言，即支援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准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我。但是整个中亚仍然是一片无主的土地，尚未为革命所征服。在此期间，与阿富汗维持外交关系就能提

供一条通往印度国境之路。苏维埃驻喀布尔的大使馆已做了大量的初步宣传工作。但那里的印度同志同国内的正在日益展开的反英不合作运动没有任何联系。我到那边去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了使我获得有效地执行职务的最大方便，驻喀布尔的新任苏维埃大使应该是一个对我的使命极感兴趣的人。

苏里茨看来搞不好与在喀布尔的所有印度革命者的关系。他们分成几个互相对抗的集团；而苏里茨却袒护一边，没有设法使他们联合起来。他说他没法使他们联合，并且很瞧不起在德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谓印度临时政府中的大部分成员。他们要求武装印度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并从财政上给以援助，使那些部落能袭击英国的领土。最近在喀布尔又出现了由一位名叫阿扎腊领导的一个新的印度小组。阿扎腊是由柏林委员会派去在那批被土耳其人在库特-艾马顿俘虏的印度军队中间进行反英宣传工作的。大战结束时，由于他所担任的使命没有成功，就同一个名叫阿卜杜·拉布的印度老商人一道到阿富汗去了；拉布声称他同边境部落中一些有势力的人物有联系。阿扎腊自称是共产党人，反对临时政府的计划。苏里茨好象很支持他，并对在喀布尔的大部分印度革命者采取敌对态度；而那些印度人全是民族主义者。据说阿扎腊之所以愿意与苏里茨在一起，是因为他怕遭到狂热分子暗杀。

喀布尔的局势显然是严重的。那种局势必须大加改善才能使阿富汗的首都成为在印度采取革命行动的前进基地。卡拉汗认为，如果鲍罗廷出任新的苏维埃驻阿富汗大使，就可以

另起炉灶了。齐采林也赞成这个主张。在我亲自同列宁讨论了这件事之后，还必须提请共产党政治局批准。

自从鲍罗廷在墨西哥向我提出建议以来，我脑海里一直在设想通过俄国来恢复同印度国内朋友们的联系。不过这个想法还很模糊。在最近的将来，我更加关心的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据我的新的想法所提出的印度革命的类型，还须进行具体的研究。接着还要考虑用什么方法从物质上帮助发展这种新型的印度革命。因此，对于卡拉汗提出来的建议，我还不能立即作出明确的答案。这个计划很有吸引力，但我必须仔细思考，并与鲍罗廷讨论一下。

由于暂时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谈，而卡拉汗也一定还有其他事情要办理，所以我建议当晚不要谈下去了，过些日子再碰头。卡拉汗站了起来，我想，大概要说再见了吧。可是，他的眼睛转向那个长长的房子另一头的大门。大门慢慢地开了条缝，一个头探进来，看样子是怕打扰屋里的人。应卡拉汗的一再要求，一个面带歉意的半夜来客迈步进来，看样子仍然活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他轻轻地随手把门关上，胆怯地走到大桌子跟前。他的副手给我介绍，这就是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同志。

欧洲外交界的恐怖情绪与他的名声完全连不到一起。人们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温文尔雅、谦虚恭谨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外交部长们的恶梦里，竟成了把其阴影投射到整个欧洲的传奇式的共产主义幽灵。在那些日子里，苏维埃政府时常发布外交照会，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行径，并预言它很快就要垮台。那些史无前例的外交文件的作者，通常被想象

是俄国许多狂热人物当中的一人：那些人是一批口含血刀的长胡子暴徒，刀上还滴着他们屠杀的天真儿童的鲜血呢。

我从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黄色报刊传播的这些恶意的故事。可是齐采林毕竟是个奇人。他中等身材，衣着不怎么考究，面孔很吸引人，留着一小撮列宁式的短而尖的红胡子，头型长而美，上面长着黄中带红的头发，有点秃顶了。齐采林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欧洲绅士，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高贵品质，因而对自己的外表就不加注意。但是，他不摆架子，很敏感。他总是因为有自己在场而表示歉意。然而，他的人格却放射出充满周围环境的东西。那显然是他的真诚、热心和完美的道德。他有一个理想，他以狂热者的信念去追求这个理想。但是这种信念是以理智上的信服为基础，它排除了盲信主义的庸俗、鄙陋和盲从。

列宁是理想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始模型。他的信仰具有保罗式的早期基督教徒信仰的特点——兼有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精神克制。用这个尺度进行衡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多少人够得上这个原始模型的标准；假若不是死神的仁慈的手过早地夺去列宁的生命，免去了他接受考验，我也不能确定他本人是否能够达得到。

根据大家所知，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就属于这种类型。我没有荣幸同他见面。我到俄国之前他就去世了。许多把自己的生命狂热地献给严格的革命理想的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都没有活多久。看来他们的生命已在狂热地献身于伟大事业的烈火中消耗殆尽了。他们都患着这种或那种心脏病或肺病。

十分奇怪的是，“契卡”(红色恐怖的可怕工具)的组织者和第一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却是另一种原始模型的布尔什维克。但在他的行为里面也没有什么真正出奇之处。那是狂热的必然结果；禁欲主义的精神克制会不知不觉地堕落为耶稣会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甚至在早期的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些布尔什维克身上也出现这种情况。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没有几个人能够熬得过来。捷尔任斯基便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他患有肺病；但对他来说，个人的道德观与他对集体主义的尘世宗教的狂热信仰之间的冲突，确实比结核菌更为致命。我之所以能够发表这样的意见，因为我有机会亲自结识他，虽说时间不长。他是一个不惜精力、忘我工作的人。丹东^①直到自己死亡的前夕，才感觉到恐怖的残忍。捷尔任斯基是个感情较多的人；每次他把一个人送上绞刑架时，他内心都为之痛哭。否则他可能会活得更长些。但人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想活下去，因为一个献身革命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出悲剧。

无数地位低得多的布尔什维克都属于斯维尔德洛夫与捷尔任斯基的类型。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俄国革命的大悲剧。然而，要是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埋头工作，革命也许不会成功。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机会荣幸地同那些历史的殉道者当中许多人见过面并一道工作过。齐采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现代史上轰动一时，以后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对他，同时也对那些重视他所体现的文化和道德价值的人来说，幸运

① 丹东 (Danton, 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译者

的是，他没有被以悲惨的嗜血面目出现的革命所吞没。他同其他接替他的那些人比较起来，革命性并不差；但他不愿为了前途飞黄腾达而损害他的有理性的见解。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都比不上他。前者相信，革命制度能够同资本主义现状和平共处，而后者则是个莽撞的煽动家。齐采林无声无息地在历史中湮没无闻了，因为他不愿意冒着使革命本身毁灭的危险来渲染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换句话说，齐采林不如托洛茨基等人那样了不起；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品质高尚，不屑于把自己降低到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搞阴谋诡计和宗派斗争的水平。

关于俄国许多革命领袖的个人特点和历史意义，我花去了多年的时间才得出这一判断。我初次与齐采林那样传奇式的人物见面，就是最终使我得以构成上述判断的经历的一部分。初次见面的印象异常深刻，足以影响后来的判断。

卡拉汗给我做了正式介绍之后，齐采林用熟练的英语同我谈话。他对我来莫斯科感到非常高兴；殖民地世界正处于熊熊烈火之中；革命必须向东发展；世界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必须在亚洲开辟。

我听了那些话感到十分满意，但我不太明白，亚洲如何才能光荣地执行分配给它的任务。当然，对现代预言家中的一员那种热情的乐观主义，我是怀疑的，但是说不出口。齐采林说，我们不久还要晤面，讨论由殖民地人民起义来帮助世界革命的巨大可能性。我对自己能受到传奇般的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的邀请，同他进行磋商，深感快慰。在印度做点工作便可促进世界革命事业的想法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我自己早已